

中國人的日本觀

林明德

一、前言

國人有關日本以及中日關係的知識，還不如一般日本人對中國知識的豐富與正確，兩國間這種認識上的不平衡，久已成爲中日關係的重大障礙，這是無庸諱言的事實。即以今日而論，日本研究中國文化，實著有成效。不僅機構多，人才衆，用力專，著述勤，甚至收藏富而學積厚，此已爲世所公認。反觀我國研究日本，迄今尙乏鴻篇鉅著，人才亦極缺乏。以中日兩國關係之密切，彼我相形，實太懸殊。這種情形視諸大學的歷史課程即可明白，難怪近代史學家蔣廷黻曾慨然的說：「我們大學歷史的課程，總是偏重英、美、法、德，而忽略日、俄；一國歷史就是一國履歷，我們交友及辦事，都知先行打探對方的履歷，在國際關係上也是如此。我們歷史系反忽略與我國興亡有關的日、俄，這是一個不可原宥的罪惡」（見「蔣廷黻選集」四一一頁）

我們一向認爲日本文化是中國的分枝，而且斷言日本文化劣於中國文化，指其毫無創意，只有模倣，其實這種看法似是而非，自古以來，中國文化對日本影響至深且鉅，日本人亦不否認，但它能獨立自發的接受、選擇、反芻，而吸收中國文化，加以創新並賦與原有較低的日本文化以新的生命與姿態，因而能形成一種日本特殊的文化，近代明治維新以後的西化（近代化）運動，其過程亦與過去的「唐化」相仿，這就是日本文化之特殊性。

我們對於日本、日本人、日本史所知有限，明知兩國關係密切，却不願下功夫去探討，一方面囿於過去蔑視「倭人」之成見，一方面則爲所謂「同文同種」所迷惑，以爲語言文字相近，易於了解，殊不知其實是既不同文，更非同種，而語文上雖多數與漢字用法相同，但其間的差異仍大，如留守（不在之意），真面目、真面白、大丈夫（認真、有趣、沒關係之意）等，意義完全不同。因此我們必須檢討過去對日本研究之缺失，迎頭趕上歐美之日本研究的水準，俾能知己知彼，促進兩國的正常發展。中日兩國在政治上固然是唇齒相依，在文化上更是脈絡相通。本文的主要目的乃在簡略的回顧，並對近代中國對日觀加以闡述，以探討中國人對日本觀的演變過程。

二、分期概述

有關日本最古的記錄，不外爲中國的史料。前漢時代所撰「山海經」，及其後的「漢書」、「史記」，均有「倭」的記述記錄。而「三國志」、「魏志倭人傳」較之「日本書紀」約早四百年，對有關三世紀前後日本的狀態有詳細的敘述，這是日本古代史上最有價值的史料。此後一直到民國，中國遺留很多有關日本的記載。依據鈴木俊（「中國的日本研究」、「中國人日本觀的變遷」）石原道傳一連串的論文（「元代日本觀的透視」、「中國善隣日本觀的展屏——唐、五代、宋時代的日本觀」等），並參照各方面的資料，概略回顧二千年來中國對日觀的演變過程。

爲了敘述方便起見，擬將中日關係史上中國

對日觀的歷史分成四個時期。第一期自古代至宋朝末年十三世紀前後，第二期自元代至清末，十三世紀中葉明治維新之前，第三期自明治維新至辛亥革命，第四期為民國以後。這類分法仍有待商榷，且各時期尚可分成幾個時代，王婆楞的「歷代征倭文獻考」（正中書局，民國二十九年）分期較細。但本文只作一概略性的分析，簡述每期對日觀的歷史與特色，而着重在近代中國對日觀的內涵。

三、中國對日觀的歷史回顧

第一期 古代至宋末

這一時期可以再分為隋以前，以及隋至宋末前後兩期。隋以前，中國史書記載「倭」的，除了上述「魏志倭人傳」、「漢書地理志」、「後漢書倭傳」、「宋書倭國傳」等之外，尚有「史記·秦始皇本紀」、「山海經」等。王婆楞稱之為「總化倭人時代」，對中國而言，日本只不過是中華之總化開始所及的遙遠之小國——「東夷」而已。雖然也有像衛挺生提出徐福即為日本神武天皇之說（「日本神武開國新考」、「徐福與日本」），但並未受到學界的公認。無論如何，根據正史記載，在隋以前，中國只是把日本看成一個在「東南大海」的未開化小國而已。

中日兩國在歷史上發生密切關係，實自隋唐開始。依據王婆楞的說法，這是「倭人向化時代」。也就是日本傾慕中國文化，所謂「全盤唐化」的時代。隋唐時代，日本完全在中國文化圈之內，奈良、平安時代的文化即是在遣隋使、遣唐

使以及日本留學僧、歸化漢人的貢獻之下產生的。雖然在宋代日本已有「攜貳」的傾向，但宋代文化對日本影響之大，仍為不爭的事實。因此，自隋唐至宋，不僅日本傾慕中國文化，致力仿做學習，而中國之對日觀，也是「善隣而友好的」。

唐以前的正史之中，日本均在東夷、東南夷、四夷等，夷狄項下列出，而「舊唐書」則變成「日本傳」，「宋史」以降，則被列入「外國傳」之中，較之過去的對日知識已有顯著的增進，但基本上仍未改變夷狄觀的態度。這種中華意識一直遺留到清末十九世紀。民國以後，一般認為維新前的日本，只不過是模倣中國文化的對日觀，在國人之間已甚普遍，可見中華意識雖稍有變化，但仍殘存，其原因主要由於這種歷史傳統的背景使然。

第二期 元代至清末

唐宋時代的善意對日觀，至元明時代一變而為戒懼與憎惡。其最大的契機為元朝之征日。元朝征日後，仍對日本加深其疑惑與戒意，復為日本武裝商人之「倭寇化」，元日關係愈惡化。於是有所稱日本人為「倭奴」的文獻（吳萊「論倭」）出現。雖然如此，元朝始終採取軟硬兼施之策，對於日本的懷柔等仍頗執著。此一方針後來為明朝所承繼，明朝視日本為「不征之國」，敬而遠之，但對室町幕府則採取綏靖政策以懷柔之。但到了明末隨着倭寇之日趨猖獗，為了防範倭寇，正史之外出現了很多日本研究的書籍，如歷史、地理、產物、文字、文學之類。這些文獻大都有一共同的見解，以為日本人是殘忍的好戰人

種而憎惡之。這種惡劣的感情更因豐臣秀吉出兵朝鮮而加劇，咒罵秀吉為「狡詐殘暴之夷」，並指日本人為「狡倭」。

元明兩朝由於倭寇與豐臣秀吉所產生「畏懼憎惡的日本觀」，直到民國以後，因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而重現。九一八事變之後，倭寇研究之興盛，其原因在此。陳立夫在王婆楞編撰的「歷史征倭文獻考」序文中，特別強調倭寇是自海面南來的日本「今之所謂南進政策」的根源，而豐臣秀吉則是策動「併吞朝鮮侵略東北所謂北進政策」的元兇，指出南進、北進兩政策乃是日本古來的一貫政策。這是民國以後，中國所持廣泛的意見。

明亡清興之後，因為日本採取所謂「鎖國」政策，中國對日本的關心漸淡，有關日本的文獻已不復多見。唯據「大清一統志」，則視日本與朝鮮、安南、琉球一樣，同為朝貢國。清代如同唐宋元明時代，仍未改變其對日本視之為東夷一小國的看法。

第三期 明治維新至辛亥革命

明治維新以後，日本急遽的採取「文明開化」之策，全力擷取西方文化，棄置漢學，採用陽曆、着洋服，「凡制度、器物、語言、文字，靡不以泰西為式」，頗引起中華意識濃厚的清朝保守派之不滿，以為日本已脫離中國文化圈而輕蔑之。他們認為明治維新是一大批政，這種改革註定失敗，斷定「亂必在二十年之間」。其後因為日本進窺琉球、台灣與朝鮮，與清朝構釁，對日本的反感日增，結果指責日本夜郎自大，膺懲日本的「攻日論」一時甚囂塵上。陳其元的「日本

記事記」(一八七四年)即爲一例。

另一方面，却有一部分人士，對日本西化表示好感的。改良派的魏源在德川幕府末年，已在其所撰「海國圖志」(一八四二年)，指出日本已有維新之萌芽，而黃遵憲在其「日本雜事詩」(一八七九年)與「日本國志」(一八八七年)之中，贊揚日本一方面吸收唐宋時代的中國文化，一方面却能謙虛而進取的擷取西洋之長處，與辦新式教育，振興工商業，評論日本維新後的近代化爲「善變」，「中興之功」，這的確是一種新的對日觀。此外，陳家麟的「東槎見聞錄」(一八八七年)，顧厚焄的「日本新政考」(一八八八年)，一如黃遵憲，贊賞日本人的進取性，並對維新新政給予很高的評價。但清朝政府內改革派的努力非常微弱，掌握大權的保守派仍瀰漫着日本不足懼的攻日論，此由朝鮮壬午事變後，鄧承修、張佩綸等人之盛唱「東征論」即可得到明證。這種對日反感日益增漲的結果，適遇日本侵略朝鮮野心之日熾，終於導致甲午戰爭。改革派(或稱維新派)的對日觀在甲午戰爭之後，始逐漸取得優勢。

以甲午戰爭爲契機，中國急速的淪爲半殖民地化，在這過程之中，清朝內部維新派一時抬頭，取代了保守派。於是保守派所持有的對日觀——即視日本爲服屬於中華文化的朝貢國，並非維新爲惡政而加以輕侮的對日觀已發生動搖，維新派的對日觀，尤其對維新後的新政給予甚高評價的對日觀乃代之以起。

保守派的對日觀在甲午戰後並非被一掃而光。西太后依然執掌清朝的實權，而「以夷制夷」

「聯俄拒日論」仍是根深蒂固的殘存。但甲午戰爭畢竟喚醒了中國「四千餘年之大夢」(梁啟超)，眼見東鄰日本效法西洋不過數十年，居然國勢日強，竟大敗中國海陸軍，於是變法興學之聲驟起，以康有爲、梁啟超爲主的維新派乃立意變法。維新派發動戊戌變法，仿明治維新，定國是，意圖樹立立憲君主政體，振興教育、產業以促進現代化。這種近代化政策，並非直接仿效西歐，而是派遣留學生赴日，譯日本文獻，學習日本的維新體制者。

梁啟超在其「論學日本文之益」一文中指出「日本於最新最精之學雖無不欠缺，然其大端固已粗具矣」，因此力呼籲國人有志新學者，宜學日本文，藉以提高學術水準，增長智慧，而使人輩出，以適應西力之東漸。康有爲亦著「日本變政考」，以日本明治維新爲變法藍本，同時又編寫「日本書目誌」(一八九六年)，倡導日文之學習，以日本爲準繩。而官僚派的張之洞，也在「一八九八年刊行一部「勸學篇」，力主派遣學生赴日留學。這時對日本的態度，已由鄙視逐漸轉爲崇拜，更羨慕其維新的成就，思以明治維新爲藍本，從事興革。自此，留學日本人數驟增，日文之翻譯亦鼎盛，其對中國政治、教育、文化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影響。由此可見中國在文化上由長期以來影響日本，一變而爲受日本的影响。這種現象的確是史無前例，當然，從日本間接學習西洋的近代化最爲簡便，且接受經過融合的日本文化較少排斥作用，尤其日本爲君主立憲制，更能符合清廷的憲政意理，這在庚子事變後的宮廷派所推動的立憲運動即可窺知。而親日的態度

在日俄戰爭之後，更形成一個劃時代的風潮。日俄戰爭的結果，日本戰勝俄國，更使國人大大爲驚異。於是，中國上下一致認爲日本以蕞爾小國打敗雄跨歐亞二大洲之大國俄國，其最大的關鍵乃在立憲之有無，即立憲日本與專制俄國之爭，對日本明治維新重新予以估評，且更堅定了國人遵循日本維新之路以圖強的決心。

在政治上宮廷派傾向於日本模式的欽定憲法，於一九〇六年頒預備立憲詔，一切以日本憲政爲典範。不僅憲政編查館，資政院、弼德院、以及憲法大綱，都是明治憲法的翻版，地方制度如諮議局調查局等之創設，各種地方自治章程等，大都仿日本而來。

在司法制度方面，法院編制法，刑法，民法等亦都聘請日籍顧問，參照德、日、法、制、而編纂，甚至連監獄的改良亦多取於日本。

再就教育制度言，不僅「欽定學堂章程」、「奏定學堂章程」大都抄自日本學制，教育宗旨、學制、內容亦多仿行日本，尤以教科書之譯自日文者爲最。另一方面，日本教習(約有五六百人)亦普遍地在各級學校教課。足見清末的「新政」，不啻爲「日化」的顯峯時期。

另一方面，在日留學生當中，標榜反清的革命派逐漸取代了立憲派而掌握了主權。革命派對於日本之戰勝俄國，認爲是一直被壓迫的亞洲有色人種對西歐帝國主義的最初勝利。並且對於標榜中國民族的獨立與中國的建設，企圖以「中日兩國國民聯會」爲政綱來達成的日本寄以熱烈的期待。一九〇八年，以「反對帝國主義，以期亞洲民族的獨立」爲目的的革命派，與日本社

會主義者及亞洲各國獨立運動家組成亞洲和親會。足見當時中國朝野對日本所示好意與期待。很遺憾的是亞洲和親會之類對日本之期待，後來却均歸幻滅，結果，日本遂事事與日本民族主義對立。

日俄戰爭雖然引起中國仿倣日本以強國的熱潮，掀起清末的立憲運動，但另一方面，也有一部分人發現日本亦蘊含著與西歐諸國同樣的帝國主義，尤其年青的知識分子，站在中國民族主義的立場，對此加以批判。日俄戰爭之後，成為革命派有力評論者的陳天華，對於日本人之蔑視中國人感到憤慨，而看破這種蔑視感與日本懷抱著進窺朝鮮，滿洲的帝國主義的野心之間的關連，擔憂中國的亡國，抗議日本的作為而蹈海自殺。其後受陳天華自殺的刺激，發生留日學生集體歸國事件。這類事件不僅限於所謂日本頒布「取締清國留日學生」之時，後來類似事件層出不窮，第二辰丸事件（一九〇八年），安奉線改築問題（一九〇九年）等而發生的日貨排斥運動不斷的發生，中國對日本的抗議日趨激烈，兩國關係愈益惡化。民國以後，中國遂進入全面性與日本帝國對立的時代。

第四期 民國以後

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中華民國建立，而新的歷史階段也從此展開，其後又以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為契機，中國民主主義革命掀起了高潮，從此屢次遭遇各種各樣的障礙與困難，內憂外患紛至沓來。中國的近現代史從對外關係來看，可說是中國對日本侵略抵抗的歷史，尤其一九一七、一九二七年以後，更是對日全面抗戰的時期。在這一

時期，中國不得不與日本作正面的敵對，抗衡，同時，日本研究也隨著時代的需要而創造了高峯。尤其一九二〇年代的後半期以降，中國從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並從各種立場來分析日本，研究日本，不斷的對日本發出抗議之聲。無論從質的方面或量的方面言，可說是中國史無前例的，廣泛的創舉。

當然，譴責日本為帝國主義的抗議之聲，在日俄戰爭時期已有人提起，其後中日關係日趨惡化，且兩國對立之擴大，主要契機乃是一九一五年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要求。二十一條問題不啻為日本對中國，尤其對滿蒙最露骨的殖民地統制的要求。因而引起國人普遍的反日情緒。及至歐戰結束，巴黎和會（一九一九年）席上，日本要求承繼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益，列強竟亦不顧中國全國人民的情感，拋棄美國總統威爾遜的民族自決原則，接受日本的要求。日本於是取得東亞獨霸地位。巴黎和會有關山東問題決定之消息傳出之後，舉國震怒，北京學生遂發起示威遊行，釀成反帝國主義的五四愛國運動。

「五四」的意義是多方面的，就政治方面言，是以反軍閥、反帝國主義為核心。但帝國主義並不僅限於日本一國，所有壓制中國的帝國主義均為中國抗拒的對象。因此，這一時期只以日本為對象，或專提日本而加以批判、研究的文獻並不多。及至一九二五年的五卅慘案發生，其情形亦相仿，與其日本，毋寧以英國為主要的批判對象。

到一九二七年，這種情形為之一變。一九二七年的日本第一次出兵山東，翌年的濟南事變，

已清晰的顯示出日本為中國當面主要的帝國主義國。一九二七年以後，中國的反帝國主義運動，遂集中於日本一國，於是研究日本、批判日本的文獻與論說乃急遽增加。而日本研究的風氣到了日本侵華最露骨的九一八事變（一九三一年）之後更為興盛。有關日本的論說無不攸關中國存亡的大問題，從各種不同的立場，不同的領域，報章雜誌、書籍，有如汗牛充棟的一齊出籠。自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七年的七七抗戰期間，可說是中國全面應付日本的時代。這種研究日本的熱潮一直延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為止。以下為了敘述方便，擬分成官僚階層與文人的對日觀以及中國國民黨的對日觀兩部分，以探討民國成立以後中國人對日觀的概況。

四、近代中國的對日觀

（一）官僚階層與文人的對日觀

這裡所說官僚階層，乃指民國以後的官僚階層而言，但從其淵源看來，應涵蓋清朝時代改革派官僚階層的系统，同時對於承繼清朝時代保守派官僚階層者，亦應一併加以考慮。改革派官僚與保守派官僚之間，在清末已顯示其在對日觀方面的差異，到了民國後，這種情形仍續被承繼。但在甲午戰爭之後，兩者之間已有部分共通的對日觀，這在上面已提及。到了民國以後，因為新興的革命努力抬頭，表示不同的對日觀，所以官僚階層之間的差異乃縮短。無論是改革派或保守派，他們都同屬於鄉紳階層，且在民國以後，多少均與封建軍閥相結，形成保守派或反動派。其中反動派官僚階層，由於固執於中國的傳統文化

，儒家思想，較之改革派官僚階層更爲頑固，始終無法擺脫古老的中華意識的窠臼。他們以爲民國以後的政治社會的混亂，乃是由於民主與科學、社會主義等新思潮的氾濫，使中國文化遭受破壞，對於新的思潮深惡痛絕，因而在對內偏袒軍閥的封建統制，對外則與日本保守派的政客，軍人或漢學家的主張共鳴。最顯著的例子是「滿洲國」成立時，贊成日本所倡「王道樂土」「德治主義」「民族協和」等主張的清朝復辟派鄭孝胥的對日觀。其後在華北、華中、華南誕生的親日政權，事實上大多包含這種保守反動派的傳統主義者。他們對於國內新興的革命勢力頗感畏懼、憎恨，因而唯有託庇於日本所倡「東洋主義」或所謂王道政治。但他們畢竟是屬於少數派，在大多數國人眼中看來，他們只不過是與軍閥或日本帝國主義勾結的保守反動派，買辦、或漢奸。因而他們的對日觀，從整體而論，只是部分或特殊的意見，不足以代表中國全體。

但連這些親日的反動派官僚，後來也對日本的專橫加以批判。當然並非所有中國的傳統主義者，儒家主義者都是親日派。中國傳統主義者之中，也有指斥日本侵犯中國土地，破壞中華的傳統與尊嚴，而憎惡，非難日本者。

在中國近代史上居於重要地位的官僚階層應是改革派，尤其在對日觀方面，改革派人土較之反動派官僚的對日觀，具有值得注目的內涵，且成爲官僚階層對日觀的主流。本節所述官僚階層的對日觀，主要是以改革派官僚階層爲主。

改革派官僚階層在清末對明治維新給予很高評價，這種好意的對日觀在民國以後仍無甚改變

。他們在清末與日本保持密切關係，民國以後仍然與日本的政界、戰界人士甚至軍人都有直接接觸的機會，因此對於日本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具有較深刻的認識。與其說他們是親日派，不如說是知日派爲更妥切。他們對於日本的侵略持批判的態度，且顯現一種強烈的抵抗意識。此由民國以後進步黨與梁啟超等改革派官僚之一面反對軍閥政府，一面抗議日本提出二十一條要求即可得到明證。承襲改革派衣鉢的研究系與政學系，後來與國民黨合流，對日本採取「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方針，不久與國民黨合作決心抗日。改革派的對日觀以蔣方震足爲其代表。

蔣方震正如其師事的梁啟超，不僅是參與實際政治的改革派官僚，同時也是在學問與文藝方面頗有造詣的文人。他們對中國的古典仍有素養，且有中國文人傳統的歷史觀，或觀察人的敏銳智慧，主要憑經驗的直覺觀察，以分析日本，觀看日本人。他們透過日本的氣候風土、與文物制度、與風俗習慣等，以觀察日本人，且有透過日本人的性格、民族心理，以解釋日本行動的傾向。這種對日觀在明治初期黃遵憲的對日觀已可見到；到民國以後，又爲梁啟超、蔣方震所承繼。此外，很多日本遊記、日本民族性論……等之中，亦可發現其傳承關係。爲此，以下特將日本民族性論作一概述，再探究蔣方震的對日觀，以略窺官僚階層、文人對日觀之一斑。

(1) 日本民族性論

中國也有很多透過日本民族所擁有的民族性，來瞭解日本的行動者。但中國並設有像西歐之

借助近代民族學、民族心理學或文化人類學的分析或理論，因此大部分都是憑經驗與直覺的「文人式」的日本民族性論。雖然如此，中國「文人式」的日本民族性論之中，却因其基於中國的歷史經驗之累積所作睿智的人性觀察，以及中國長期與日本文化交流的歷史以及與日本親身接觸所得的具體知識，加上面對日本的侵略，非與日本作殊死之鬪不可的境遇，故能包含西歐各國近代「科學」所無法瞭解的，有關日本民族性的洞察。

中國的日本民族性論既以體驗與直覺爲主，當因各人的歷史觀與體驗的差異，觀察的深淺而有所不同。有膚淺的，也有深入的，有好感與敬意，也有惡意與反感，真是形形色色，不一而足。陶亢德編「日本管窺」（上海宇宙風社，一九三六）乃是蒐集「宇宙風」雜誌上有關日本關係之論文編輯而成。另有信濃憂人所著「中國人所見日本人」（原書名「支那人の見た日本人」，青年書房，一九三七）一書，則爲編輯「宇宙風」「生活週刊」等雜誌上所載日本遊記或評論日本民族性、風俗、習慣、文化等之短文而成。這兩本書同爲表示中國「文人」對日觀最好的文獻。本節即以上據述二書爲主，參照其他資料，檢討錯綜複雜的中國人所作日本民族性論。

廖世承的「遊日鳥瞰」與胡行之的「印象中之日本」，羅牧的「日本人」等，均一致指出日本人的勤勉。幾乎所有中國人都認爲日本人樸素而勤勞。至於探求日本人所以樸實而勤勉的原因，雖頗多由於與日本人交遊所得感想，但也有從武士道，宗教心來解釋，或歸因於國土狹小，山

水清秀的自然條件，或求之於日本人口衆多、生存競爭之激烈，以及其他社會、經濟因素者。更有歸之於忠君思想與愛國心者（傅仲濤、羅牧即是）。既認日本人的儉樸與勤勉係由於武士道與愛國心所致，必然會舉出武士道與愛國心這些「好的一面」，即其民族性之「尚武、有爲、積極、剛毅」。這種積極、進取、剛毅的看法，也是大部分中國人之間的看法。但另一方面，却也不放過武士道與愛國心的「惡的一面」，即「殘忍、殺伐、情急、小器」，或「偏狹、自尊、傲慢、誇大」的性格，爲日本民族性的缺陷。孫中山先生也指斥日本的政治家與軍人「眼光如豆」。

以如此大的尺度來看日本民族時，中國人又會指出日本人一方面具有模倣他國文化的優越才能，一方面却因而欠缺獨創性而沒有自己獨特的文化。謝晉青在其「日本民族性研究」（東方文庫、商務印書館、一九二三）一書中，指摘日本明治以前的一切典章文物專模倣中國，而明治以後則又巧妙的模倣西洋文化，這類日本民族性觀、日本文化觀，實淵自先秦或唐宋以來建立燦爛輝煌文化的中國人內心孕含對本國傳統的自負。雖然斷定日本人擅長模倣，而日本文化缺乏獨創性，却亦不否認日本人之模倣並不單只模倣，而能採人之長以補己之短，即一面接受外來文化，一面保持其傳統而不失其固有的文化。尤其在藝術與生活層面，日本實有其獨特的文化，因而也有少數人對源氏物語、和歌、俳句、浮世繪、或其愛好清潔、酒脫，閑適的日常生活表示嚮往者。並認爲日本人在和歌、俳句或日本料理、

插花等所顯示的感情，或纖細而清潔淡白的審美感覺，乃是由於日本清澈的河流、秀麗的河山所圍繞的島國之自然條件而來。蔣方震亦指出日本的自然環境形成日本民族「悲劇的性格」，不少人贊美日本風光明媚的自然，以及優雅溫柔體貼而不辭勞苦的日本女性。另一方面，却認爲這種自然環境，同時也造成日本民族的性急與小氣，對瑣細事敏感的神經質性格，或有唯美主義，耽美主義的傾向。

此外，又有從社會構造或階級制度來考察日本的民族性者。謝晉青以爲日本社會根深蒂固的封建階級制，產生了日本民族的奴隸性、服從性、嫉妬、陰險，內部互相排斥的派閥性，恃衆好鬥的叛逆性，而土地的狹小與人口之增加所造成的侵略性，承繼了豐臣秀吉與倭寇以來的歷史遺傳。

中國的日本民族性論尚不限於以上所舉諸端，其他尚有由各種角度所作感想或見解，但大體上所見均大同小異。

(2) 蔣方震的對日觀

蔣方震爲北方官僚的佼佼者，與梁啟超同樣反對袁世凱的獨裁，其後一度擬擁立獲得日本援助以圖統一中國的軍閥吳佩孚。蔣氏曾留學日本，娶日人爲妻，與日本人頗多接觸，屬知日派，但在九一八事變之後，眼見日本大舉侵華，頓悟與日本之間已無妥協餘地，因而決心與國民黨協力，共同抗日。一九三八年出版「日本人——外國人之研究」，批判日本人。蔣氏指陳「突入革命與戰爭之狂亂之中」的日本民族，正在演出

一齣「比哈姆雷特更悲慘的悲劇」。

蔣氏以爲日本這一「悲劇」之起因，實由於日本民族的人格構成與自然環境等各項條件。日本民族從人種上言，主要是由南方移來，因而具有南方種族的熱情性格，這種熱情的性格，加上日本風光明媚的氣候風土，清澈的激流，地震與火山等自然條件的影響，使日本民族成爲一種易受複雜環境所動，而缺乏洞察事物，把握本質之自省能力的民族。由是養成性急而偏激、帶有厭世的悲觀色彩，可說是一種「無常觀」之悲劇的性格。這種悲劇的性格，由新鮮的「生魚片」，帶有哀怨動人的「尺八」（簫）、以及「爲花寧爲櫻樹，爲人應爲武士」這一句即可推想出來，而表現「悟」與「空」最高境界的「大和魂」與「武士道」之中，即可看出其「無常觀」。代表這種「日本精神」美德，或足爲日本民族悲劇性格之模範者，實爲西鄉隆盛。蔣氏以爲正如西鄉隆盛爲其信奉者所進而不得不自殺，日本民族亦將由於其宿命的悲劇性格，必爲年青軍人導向悲劇的結局。證之歷史的演變，日本之戰敗，蔣氏這種推測誠屬不謬。

(一) 中國國民黨的對日觀

(1) 孫中山先生的對日觀

國父孫中山先生是中國國民黨的創始人，他的對日觀實爲中國國民黨對日觀的原始典型。孫中山先生的對日觀在其「上李鴻章書」（一八九四）中已可見其端倪。此文主旨乃舉出日本後於中國接觸西歐文化，却因舉國實行「四大綱領」（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

，而能先於中國，達到大有可觀的維新成果。因此主張中國亦應取法日本的明治維新，實行革新。

這種見解與康梁變法維新運動時期，着重明治維新，仿倣日本以圖中國維新的對日觀頗為一致。此後孫先生對日本明治維新給予甚高評價，並強調有必要學習維新精神的見解一直沒有改變。在一九二〇年代，仍不斷指述「日本的維新是中國革命的前因，中國革命是日本維新的後果」，「日本的維新是中國革命的第一步，中國革命是日本維新的第二步。中國革命與日本的維新實具有同一意義」，可見孫先生的晚年仍然認為明治維新是中國革命的先驅，因而力主學習維新志士，以遂行中國革命。

日本的維新為何以能成功，孫先生歸之於日本維新諸豪傑，醉心於中國大哲學家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學說，故能具備獨立尚武的精神，完成救國救民之大功。這種明治維新觀到辛亥革命時，因革命理論隨著革命運動的發展而稍有改變。即認定日本明治維新之成功，以及維新後之發展，乃是採取「解放門戶」，而具有「開國進取」的積極性使然。這是符合當時熱衷於導入外資以建設民主共和國的構想，而對明治維新所作評價的觀點修正。

孫中山先生所以對明治維新給與很高評價，尚有幾個原因，譬如在其逝世前，仍在呼籲「中國與日本為同文同種之國，兄弟之國」，一直認為中日為唇齒關係，利害與共，無日本，則無中國，無中國，則無日本，並且高唱「中國是中國人的中國」，「亞洲為亞洲人的亞洲」，而給亞

洲民族對「亞洲為亞洲人之亞洲」無限希望的，乃是明治維新後，日本奮發圖強，尤其在日俄戰爭一役，日本戰勝俄國，「推翻了俄國侵略世界政策，保全東亞的領土」所致。但這種對日本的期待却歸於幻滅。

一九一一年，孫先生抨擊日本政府吞併台灣、朝鮮之後，仍企圖併吞全中國。雖然不惜批評日本政府以及執日本政治牛耳的政治家與軍人，但對於繼承維新志士的「民黨」「民間志士」仍寄以殷切的期待。

日本的侵華日熾，孫先生譴責日本「帝國主義的野心」，指其為追求「功利」「強權」的「霸道」，一九一八年與一九二一年，兩度激烈的抗議日本帝國主義，並且斷言日本政府與武力派背叛公理，專事侵略戰爭，必將遭受覺醒的中國之抵抗。

孫先生雖然嚴厲的批判日本之「霸道」，却仍確信日本終會回到「仁義道德」之途，與中國共同促進「大同之世」的實現。遺憾的是日本並未懸崖勒馬，反而變本加厲的侵略中國，辜負了孫先生的期待與苦心。到了承繼孫先生的戴季陶的對日觀，對日本已不再有任何奢望，而是以反感、絕望為基準。

(2) 戴季陶的對日觀

戴季陶的「日本論」乃是近代中國代表性的一本對日觀的論著。

戴季陶字天仇，留學日本。一九〇九年畢業於日本大學法科，隨即歸國，任新聞記者頗為活躍。他在辛亥革命前夕加入同盟會，民國以後為國父所識拔，以擅長日文而為國父秘書，常隨國

父赴日。一九二七年著「日本論」，為國民黨對日觀的代表性著作。這本書與清末黃遵憲的「日本國志」並列，可說是國內絕少的日本論中的佼佼者。甚至在日本先後已出版了五種以上的譯本。評介的論文不下數十種。

戴季陶的日本論，一如三民主義的解釋，基本上仍是承繼孫先生的見解。但與孫先生之對日本懷著好意與期待不同，戴氏的日本論，却是由批判日本，向日本抗議出發。因為戴氏開始活動已在日本「帝國主義的野心」完全暴露的民國以後的時代。

一九一一年，戴氏在上海創辦「民權報」，並於翌年將其評論輯為「戴天仇文集」出版，其中曾尖銳的批評日本，這是他日本論的開端，他評謂：「日本者東方之德意志也。其國力既足以自保而有餘，而以人口增殖、土地限制之故，絕不能不為外之擴張也。琉球併吞矣、台灣占領矣、高麗亦亡矣，則其勢之所趨，必進而侵略中國內部，亦勢之使然也。」

由此可見戴氏對日本極為憤懣。後來隨孫先生幾次赴日，與桂太郎、犬養毅等要人會晤，加深其對日本的認識。一九一七年在「民國日報」發表「論日本觀察」，一九一九年又在「建設雜誌」（一卷一號）發表「我的日本觀」。其後經過資料的蒐集與補充，並從事歷史的研究，而於一九二七年完成「日本論」（一九二八年出版）。

戴氏承襲孫先生評斷明治維新為「中國革命的第一步」，而表達一類似的看法，以為「從東方合體來看，日本維新的成功，的確是有色人種

覺悟的起點，東方民族復興的起點」。續又承接孫先生所指陳，導致維新成功的基本原因在於日本人具有「朝氣」、「冒險精神」、「民族主義」，「志士仁人的捨生救國」的愛國精神，而闡明日本人所具有「信仰心」「向上心」「武士道」等日本原有的民族精神，認為日本成功的主要原因，一是有時代的切實需求，一是有人民共同的信仰。而這兩個原因，又適同歸結在歷史上「日本民族統一發展能力已經確實具備」的一點。

戴氏說「日本人的特質」，乃是由「武家時代」的習性所產生「好戰的國民之戰鬥的生活的結晶」——「戰鬥的精神，超越生死之力」。這就是所謂「尚武」精神。另一方面，則成為「溫帶島國美麗山川風物的表現」的「優美閑靜的意識、精巧細緻的形態」。雖然氣宇尚欠偉大，而這種純潔、積極的、犧牲的，鬥爭的，熱烈的「信仰力」以及優美、精緻的「愛美」精神，產生了日本民族的「信仰心」，導致維新的成功。

日本民族的這種「信仰心」，源自「萬世一系、天壤無窮」而自稱「神選民族」的「皇權神授思想」，這種「迷信」的神權思想，以及「犧牲的鬥爭精神」所傳承的佛教思想，武士道之中蘊含的儒家思想，到底如何建立日本民族的「信仰心」，戴氏將之追溯到歷史，引出德川時代的古學派與陽明學等學說加以評論。尤其在武士道之中，發現這種日本民族信仰心之精髓，而斷言「日本的改革，……完全是武士一個階級發動出來的事業」。

依據戴氏說法，日本的武士道起初是發自封建制度下的「食祿報恩主義」。加上基於祖先崇

拜原理的神權思想、被解釋為犧牲的鬥爭精神的佛教思想，且以吸收學自孔子真髓的儒家思想，而「由制度論的武士道，一為道德論的武士道，再進而為信仰論的武士道」。由是促成「輕生死、重然諾、尚意氣」的積極、尚武精神，同時又產生了具有藝術性的武士道。

然而維新後，隨著日本的隆盛，「町人根性」（町人即商人之意）取代了武士道而支配了日本。進一步的說，具有現實而卑劣險險的「町人階級」的「御用商人」，於維新之後，與「得意」的武士階級——官僚、軍閥相勾結，而使日本的資本主義發展。因此，支配日本的，為武士直系的軍閥、官僚以及武士、町人混合體——資本家、工商學者。於是「現代日本上流、中流階級的氣質，完全在「町人根性」的骨子上，穿了一件「武士道」之外套而顯現出來。尤其關東大地震之後，日本民族的墮落極為顯著，日本民族所有的「信仰心」也喪失殆盡。穿著「武士道之外套」者，則當時首相田中義一為典型人物。因而痛斥田中義一，尖銳的分析田中義一所代表的日本大陸政策。

戴氏認為日本大陸政策的帝國主義性格，在「征服四圍的民族」，「文死世界」這種日本自古以來的「神權思想」之中，已有其萌芽，而日本軍部則承繼這種遺產，在日俄戰爭之後，日本從「國家主義」轉為「軍國主義」「帝國主義」之前，即在「民族主義」之前，已經具有此一性格。戴氏對此明白的加以指出：

「（日本）的民族主義開始的時期，已經包含著帝國主義的胎種。我們試讀山鹿素行所著的

神皇正統論、中朝事實、德川光圀所編的大日本史、賴山陽所著的日本政記，我們已經很感覺到日本民族的目的，不僅在統一民族，而在征服四圍的民族，建設大帝國了。」

戴氏撰寫「日本論」的最後，即一九二七年夏天，在其非難蔑視的日本帝國主義的代表人物——田中義一首相主持下，日本召開了所謂東方會議，決定對中國的強硬政策。翌年即爆發了濟南慘案，嗣又掀起了九一八事變，而進入中日的全面戰爭，擴大中日間的一「大衝突」。

戴氏的「日本論」，與東方會議所決定的「田中奏摺」的內容頗有雷同之處，一如「田中奏摺」所示，對日本之「征服滿蒙、征服中國、征服世界」的大陸政策所作預言不幸而言中，同時成為濟南慘案後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日本批判，日本研究的前導，不啻為後來中國對日觀的共同遺產，受到很高的評價。

國民黨的對日觀當不僅限於孫中山先生或戴氏之論，但因篇幅關係，只能以代表性的論述以概括之，且以一九三〇年代為斷限，雖不能從此以窺全貌，但已能略知所以，至於現代對日觀的問題，有待來日之整理與分析。

歡迎長期訂閱

● 全年五百四十元

◆ 款匯：一五四四八八

◆ 大學雜誌社帳戶